

四十不惑： 中国改革开放 发展经验分享

蔡昉◎著

Perceiving Truth and Ceasing Doubts:
What Can We Learn from 40 Year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四十不惑：

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验分享

Perceiving Truth and Ceasing Doubts:

What Can We Learn from 40 Year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蔡昉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十不惑：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验分享 / 蔡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5

ISBN 978 - 7 - 5203 - 2244 - 7

I. ①四… II. ①蔡… III. ①改革开放—经验—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569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茵
责任校对 李莉
责任印制 王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3.625
字 数 220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从而立到不惑	(1)
第一节 人均收入的翻番	(2)
第二节 世界减贫范例	(8)
第三节 中国特色“三农”政策	(17)
第四节 社会保护从无到有	(26)
第五节 不断提高的发展包容性	(37)
第二章 发展是硬道理	(43)
第一节 “风景这边独好”	(44)
第二节 “中国崩溃论”	(51)
第三节 高速增长的源泉	(56)
第四节 转向发展新理念	(61)

第五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73)
第三章 改革是根本动力 (83)	
第一节 中国改革的逻辑	(84)
第二节 激励机制与治理模式	(93)
第三节 市场竞争环境	(102)
第四节 发展型政府	(111)
第四章 全球化与中国因素 (122)	
第一节 全球化的含义	(123)
第二节 赶超与趋同	(130)
第三节 打破供给瓶颈	(133)
第四节 是“为人作嫁”吗?	(142)
第五节 大国效应	(149)
第六节 “雁阵”还是“巨龙”	(155)
第五章 发展阶段与转折点 (169)	
第一节 经济发展阶段	(170)
第二节 中国经济转折点	(177)
第三节 认识宏观经济形势	(190)

第四节	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200)
第五节	如何应对增长减速?	(206)
第六章 可持续增长引擎		(213)
第一节	从供给因素着眼	(214)
第二节	劳动生产率	(225)
第三节	资本深化	(233)
第四节	全要素生产率	(241)
第七章 超越人口红利		(249)
第一节	未来的就业挑战	(250)
第二节	教育可能过度吗?	(266)
第三节	应对未富先老	(280)
第八章 实现均衡发展		(292)
第一节	提高劳动参与率	(293)
第二节	城市化的本质	(306)
第三节	农业当自立	(319)

第九章 重新界定政府职能	(337)
第一节 打破政府悖论	(338)
第二节 拆除配置障碍	(348)
第三节 患寡，也患不均	(356)
第四节 社会保护不是负激励	(374)
第十章 拥抱伟大复兴	(391)
第一节 “李约瑟之谜”	(392)
第二节 两个“百年目标”	(406)
第三节 全面小康目标	(411)
第四节 现代化的含义	(416)
第五节 爬坡与攻关	(426)

第一 章

从而立到不惑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孔子十一代孙、西汉经学家孔安国对这句话的权威解释是：“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就是说，30年叫做一代，治理国家者施行仁政，解决民生问题，30年是一个可以初显实效的时间区段。以1978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起始，到2008年为30年，到2018年为40年，其间中国经历的巨大变化是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罕见的。而在三十而立到四十不惑的1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种变化更显突出。

改革开放成就最突出地表现为民生的普遍改善。即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居民收入整体提高的过程中，政府也实施了大规模的农村扶贫规划，着力解决“三农”问

题，并在推动城乡就业扩大的同时，加强了劳动力市场监管，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保护机制，为劳动力市场上的脆弱群体提供了基本安全网。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40年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是包容式的。但是，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速度快慢不一，社会保护得到改善的程度也有差别，表现为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和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都构成不容回避的政策挑战。

◆第一节 人均收入的翻番

在迄今为止的整个改革开放期间，即1978—2011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得以保持每年近9.9%的速度。不仅是经济总量，人均收入增长也创造了奇迹。这期间，剔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8.8%。按照统计学的一个拇指法则，7%的年均增长率可以实现10年翻一番，而10%的年均增长率则可以在7年实现翻番。由此可以想象，上述人均GDP增长速度在30年乃至40年的

持续，可能产生的效果。

让我们来比较不同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上，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英国在 1780—1838 年花了 58 年，美国在 1839—1886 年花了 47 年，日本在 1885—1919 年花了 34 年，韩国在 1966—1977 年花了 11 年。而中国在 1978—1987 年只用了 9 年的时间，随后又在 1987—1995 年和 1995—2004 年分别用 8 年和 9 年时间再次两度翻番，并于 2011 年再翻一番，而这一次只用了 7 年的时间。2011—2016 年期间，人均 GDP 实际增长每年为 6.9%，再次翻番指日可待。

经济史学家发现，自 18 世纪较晚的时期开始，即大致以工业革命为界，世界经历了一个国家之间发展水平的“大分流”，随后则形成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的分野格局，至今未变。因此，经济学家从事研究孜孜不倦的热情和持久动机，就是探索后进国家如何在人均收入上赶上甚至超过先进国家。而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在于落后国家能否发动起一个快于先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并在较长的时间内加以保持。作为低收入国家，如果能够长期保持足够高速的经济增长速度，无疑会创造赶超奇迹。

中国 GDP 总量在 1990 年只排在世界第 10 位，到 1995 年，中国超过了加拿大、西班牙和巴西，排在第 7 位，到 2000 年，中国超过意大利，晋升到第 6 位。随后，在 21 世纪前 10 年中，中国又依次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到 2009 年终于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仅位于美国之后。2011 年，中国 GDP 总量为 11.2 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 60.3% 和世界的 14.8%。中国在近 40 年的时间里，显著地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差距。这一经验充分证明，只要选对了道路，即坚持改革开放促经济发展的方向，相对落后的国家完全可以实现赶超。

当 GDP 总量被创造出来之后，如何在各种生产要素之间，或者经济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例如在资本要素所有者和劳动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或者在劳动者、经营者和国家之间的分配，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分享水平。换句话说，要看一个经济增长奇迹是不是真正惠及民生，除了观察人均 GDP 的增长速度，更要看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调查数据显示，从 1978 年到 2015 年的 37 年时间里，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都以惊人

的速度提高，剔除物价因素之后，农村和城镇居民的家庭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8.2% 和 7.3%。与此同时，农村人口比重从 82% 下降到 44%，意味着整体收入水平的明显改善。从变化趋势上看，在 20 世纪 80 年代，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提高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0 年代开始，农村居民收入提高速度相对滞后于城镇居民收入，而在 2004 年以后，农村居民收入重新拾起了较高的速度，呈现逐渐快于城镇居民收入的趋势。

在分析城乡居民收入数据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常常被忽略的事实，即研究者习惯于激烈抨击的城乡收入差距，实际上并没有普遍认为的那么严重。通常的计算方法是，把每年的名义城乡收入，以农村居民收入作为 1，来计算两者之间的比率。按照这个方法，2015 年城镇居民名义收入为 24565 元，农村居民名义收入为 7917 元，城乡收入比为 3.1，无疑高于 1978 年的 2.57，比历史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 1983 年（1.82）更是高出许多。但是，由于农村与城镇的生活费用不尽一致，物价变动幅度也不同，这种忽略了价格因素，依据城乡名义收入计算收入比的方法是不科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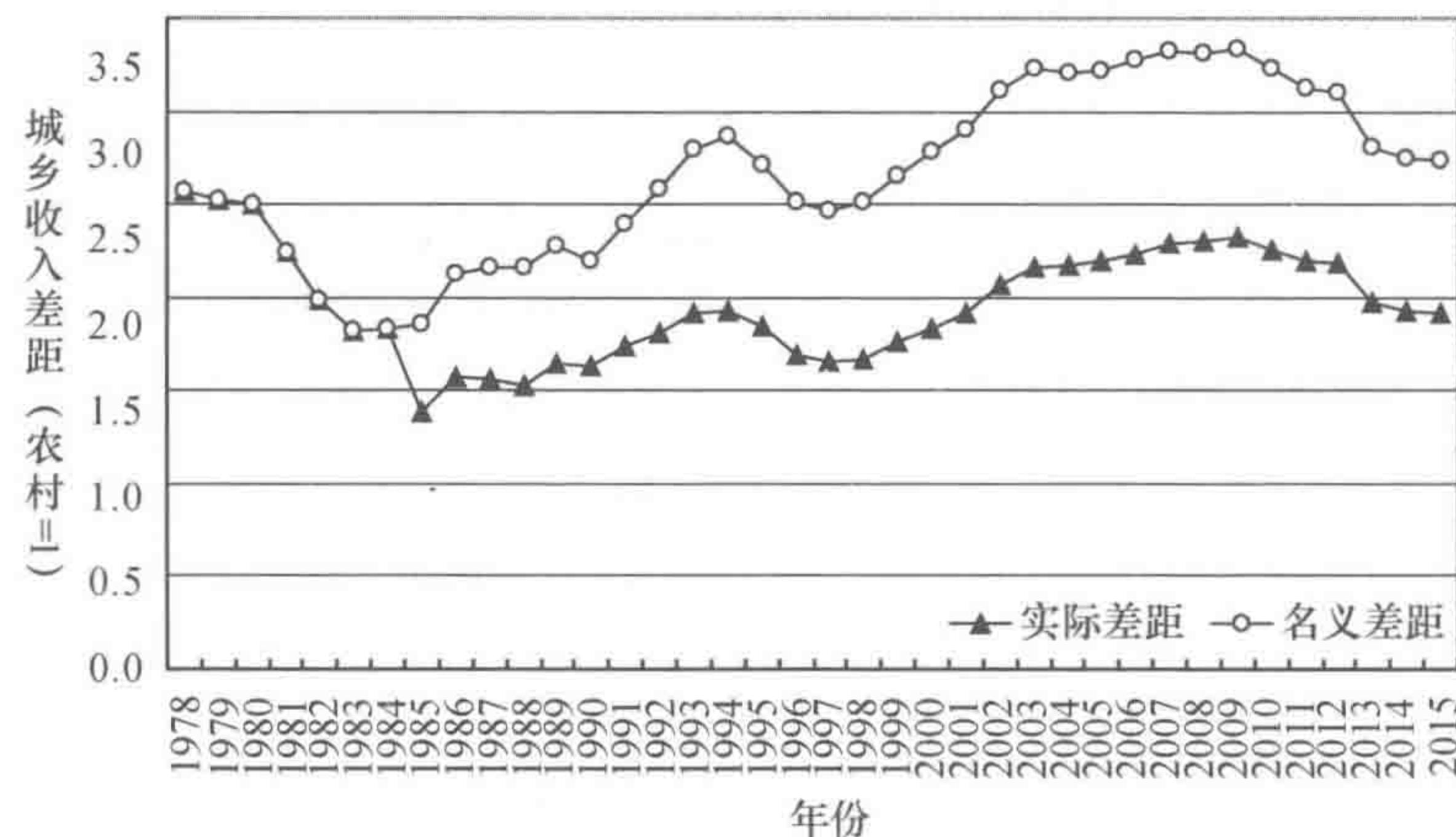


图 1—1 实际城乡收入差距起伏中趋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按照城乡不同的消费价格指数进行调整，我们计算出可比的历年城乡居民收入，以及城乡收入比。观察这一组城乡收入比数字，我们发现，其一，2012 年的城乡收入比为 2.18，已经低于 1978 年的水平；其二，这个收入差距比 1988 年的 1.52 仍然高出不少，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 U 字形的变化过程，即在改革之后一度显著下降，随后再次扩大；其三，2012 年的城乡收入差距已经低于 2004—2011 年三年的水平，显示出缩小的趋势；最后，自 2013 年开始，

国家统计局采取了城乡一体化的调查口径，把此前农村采用农户纯收入和城镇采用可支配收入，统一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按照最新数据，2015 年城乡收入差距已经缩小为 1.91。

不仅如此，现行统计体系中的住户调查，因遗漏了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收入，因此，图 1—1 中显示的城乡收入差距，很多年里仍然包含着高估的成分。由于官方统计系统内的住户调查，在 2013 年以前是分城乡独立进行的，因此，举家迁入的农村家庭和外出打工农村家庭成员，既因难以进入抽样范围而被显著排除在城市样本外，又因长期外出不再作为农村常住人口，而被大幅度排除在农村样本住户的调查覆盖之外。

一些研究者无疑注意到了现行城乡住户收入统计的这一缺陷，尝试从不完善的统计体系中挖掘出相关的证据，告诉我们更加接近于真相的城乡收入差距。他们选择一个发达地区省份浙江和一个西部省份陕西，通过对包括统计局记账户和抽取的其他住户进行调查，重估了被城市和农村遗漏的农民工收入。结论是，仅因官方统计系统的住户调查抽样和定义中存在的问题，就导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被高估 13.6%，农村居民纯收

入平均被低估 13.3%，城乡收入差距平均被高估了 31.2%^①。

◇ 第二节 世界减贫范例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不仅实现了世界上最快速的经济增长，最大程度地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也实现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扶贫、减贫。1978 年，按当时中国政府确定的贫困标准每人每年 100 元统计，不足温饱的贫困人口为 2.5 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 30.7%。1984 年，扶贫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 200 元，贫困人口下降到 1.28 亿人，贫困发生率降低到 15.1%。进一步，按照 2010 年的扶贫标准 1274 元统计，农村贫困人口从 2000 年的 9422 万人，减少到 2010 年的 2688 万人，相应地，贫困发生率从 10.2% 下降到 2.8%

^① 高文书、赵文、程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统计的影响》，载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 12——“十二五”时期挑战：人口、就业和收入分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28—242 页。

(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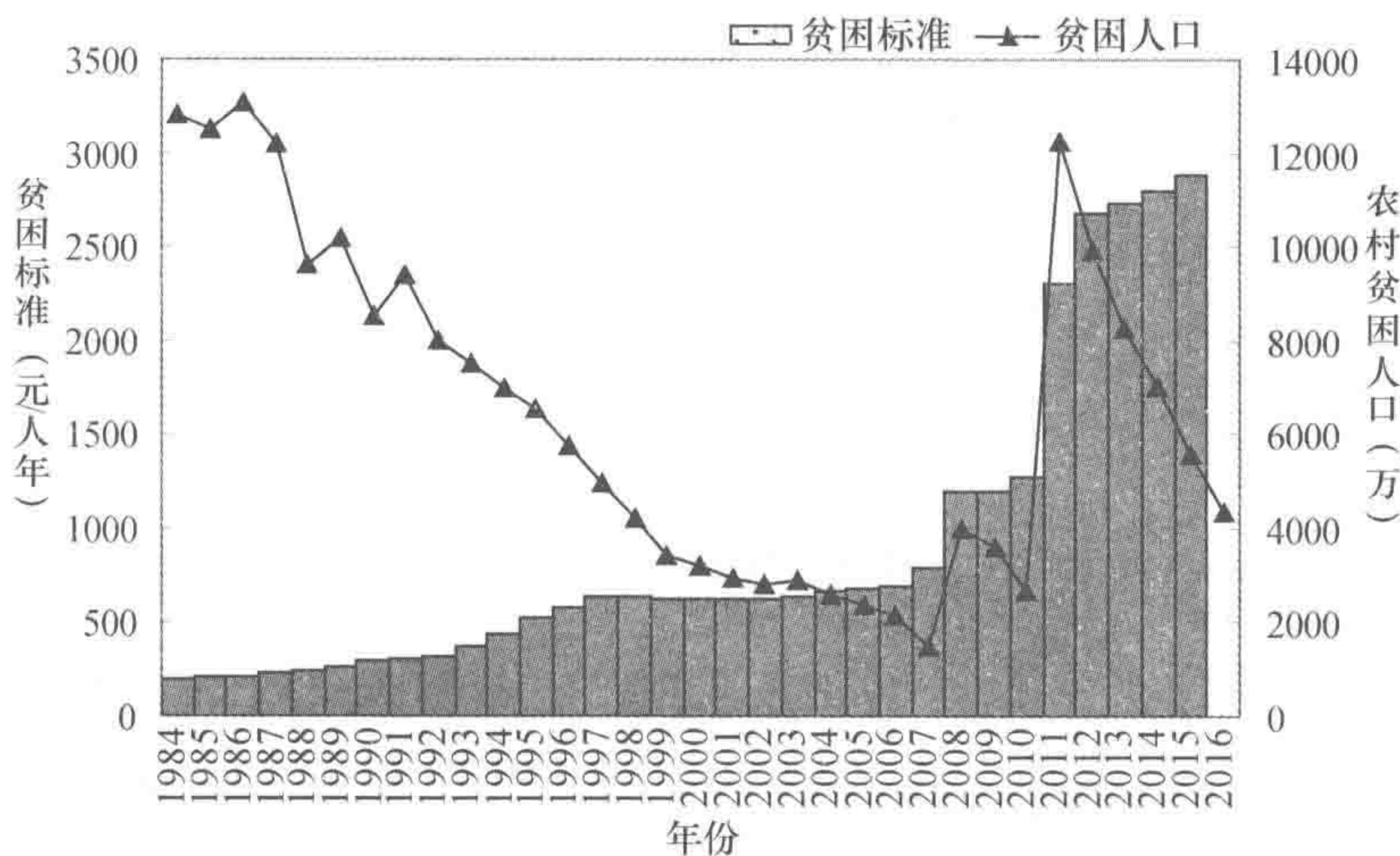


图1—2 扶贫标准提高的同时贫困发生率下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1年中央政府把国家扶贫标准大幅度提高到以2010年不变价为基准的2300元，比2009年提高了92%。这一新标准的出台，使得全国贫困人口数量和覆盖面由2010年的2688万人扩大到了1.28亿人。按照国际可比的购买力平价法，这一新的扶贫标准相当于人均每天1.8美元，超过了世界银行2008年制定的每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如图1—2所示，在这个新标准下，农

村贫困人口继续大幅度减少。李克强总理在 2018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2—2017 年的五年中，共帮助农村贫困人口 6800 多万脱贫，按照新标准计算的贫困率从 10.2% 下降到 3.1%。

中国扶贫开发以及在整体上提前完成千年发展目标的巨大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世界银行认为，中国扶贫开发所取得的成就深刻地影响着国际社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认为，中国的扶贫成就为发展中国家甚至整个世界提供了一种模式。亚洲开发银行认为：中国扶贫开发有许多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学习。中国扶贫领域取得的成就，在亚洲首屈一指，中国政府完全可以为之骄傲。

这些国际机构承认，30 年来，全人类取得的减贫事业成就中，三分之二应归功于中国。其实不仅如此。在 1981—2013 年期间，按照世界银行标准界定的全世界绝对贫困人口，即每天收入不足 1.9 国际美元（2011 年不变价）的人口，从 18.93 亿人减少为 7.66 亿人，同期中国从 8.78 亿人减少为 2517 万人，这就是说，中国对全球扶贫的贡献率为 75.7%。这是中国对国际扶贫和发展事业的巨大贡献，也是对人类文明和进步事业的巨大贡献。